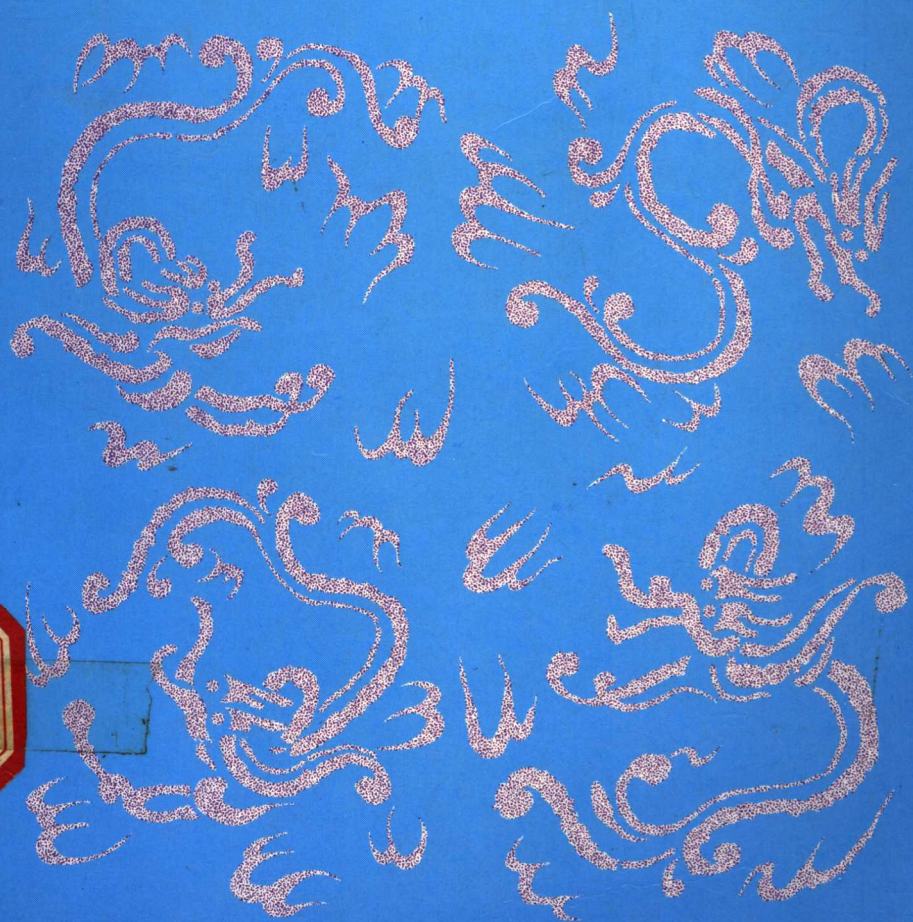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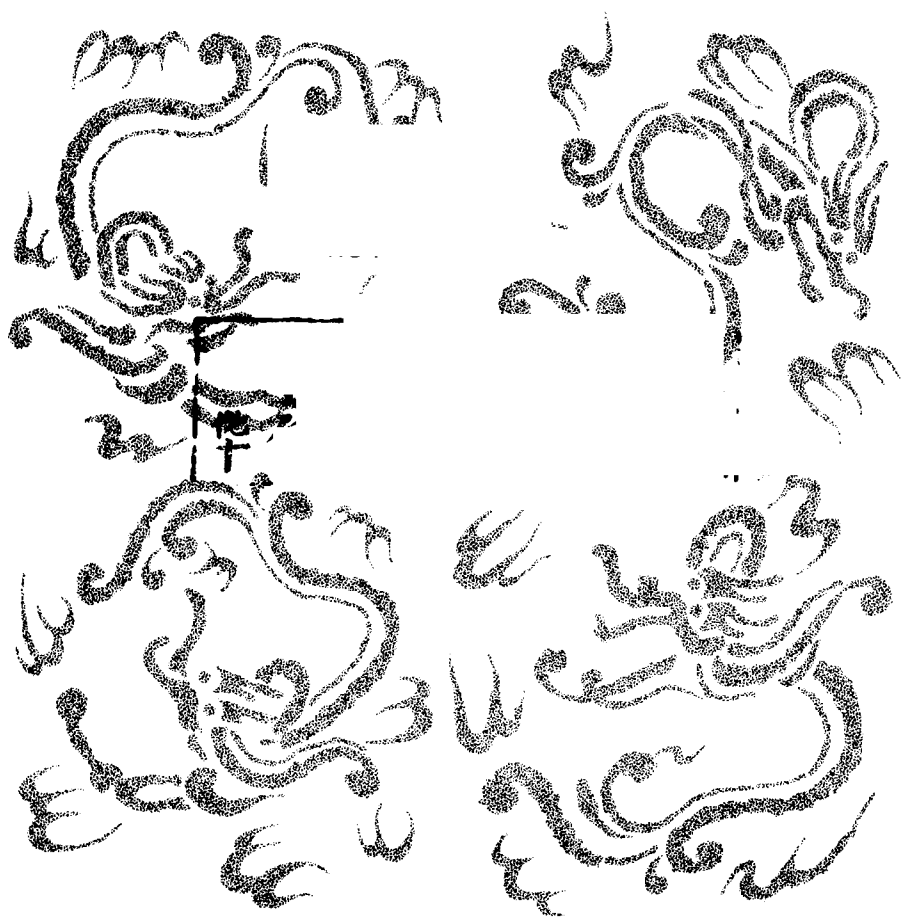
論「四小龍」

魯凡之著



論「四小龍」

魯凡之著



書名：論「四小龍」

編著：魯凡之

出版：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Wide Angle Press Ltd.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八樓 電話：5-753877

圖文傳真機：(852) 5-8381079

195-197, Johnston Rd., 7/F. Wanchai, Hong Kong.

Fax：(852) 5-8381079

發行：華風書局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七樓 電話：5-749495

承印：友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1988年11月初版

定價：港幣50元

書號：ISBN 962-226-280-5

序：

香港繁榮的「震撼」與「四小龍」

在中國年青知識分子中有著影響力的金觀濤、劉青峯夫婦，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美國居留研究了一年之後，返國途中於香港逗留了一個月，期間我曾與他倆相敘閒聊，當我問及他們對美國及香港有何觀感時，他們的答案卻使我稍覺意外——金、劉的共同意見是，在他們抵達美國之初，誠然有著所謂「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但卻比不上來到香港所感到「震撼」的強烈，香港的現代化水平實在超乎他們原來的想像之外，甚至認為香港比紐約更繁榮！香港對他們所引起的「震撼」程度反過來構成了對我們的一定「震撼」。

香港的繁榮已經超過了美國第一大城市紐約，這句話我並不是第一次聽到，好些從美國回來的朋友都如是說；誠然，所謂「繁榮」有多方面的準則，香港或許確實在好些方面的繁榮準則超過了紐約，而紐約及整個新英格蘭區域在美國已處於衰老狀態，美國現在發展最迅速的新興區域是在西部太平洋沿岸及西南部的德克薩斯州一帶，但無論如何，紐約仍是美國精粹之區，香港能夠在好些重要發展方面超過紐約，實在是不簡單的事——那至低限度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香港雖仍在不少場合被因襲地留在「發展中地區」的舊名單內，但實際上其現代化發展的程度，都已經擠上了舉世最先進地區之列。

差不多10年前，當我初抵倫敦的時候，其後更曾在巴黎生活了近一年的時間，那時我便已覺得香港比這兩個歐洲最大城市繁榮；雖然香港社會的發展有著明顯不平衡的畸型性，而倫敦和巴黎的城市機體要比香港健康，並且有著重要國家首都的氣派（這都是香港缺乏的），但若論市區建築的現代化、論商場的繁華、論市民的經濟活動衝力，香港顯然早已居於巴黎和倫敦之上。

11/10/02

大概由70年代開始，世界上便逐漸興起了一種說法，認為世界的發展重心將由所謂「大西洋時代」過渡往「太平洋時代」，這種估計的事實根據，至低限度在經濟成長率方面已經不容置疑，亞洲太平洋區連續十多年成為全世界經濟成長率最高的區域；這其中，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四個地區更經常名列榜首，從而被稱為「亞洲四小龍」——我們身在香港，目睹這裏從70年代延續至80年代的高速發展，再和長期以來在經濟上居於領先地位的西歐、北美先進工業化地區作出比較，便當肯定所謂「太平洋時代」將要來臨的說法並非虛言，香港的繁榮程度相繼超過了倫敦、巴黎、紐約等西方的「世界大都會」，正是一個顯著的表徵。

所謂「太平洋時代」在今天雖然仍未是充分的事實，但卻已確實是逐步發展中的事實，而主導了世界發展兩百多年的「大西洋時代」雖然仍未完全過去，但也顯然已是在漸漸淡出。

自從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即在大西洋北部區域掀起而衝擊全世界的「西方的挑戰」（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語），雖然迄今還在世界的整體性發展中居於優勢，然而，東方在局部「西化」結合本土傳統文化既改造、又承傳的過程中，已經有跡象及事實顯示出正在走向有效的「回應」，以至對西方反過來提出「新挑戰」——這一過程，也就是「大西洋時代」向蘊釀中的「太平洋時代」轉移的過程。

現在可以看到，或許在21世紀中期便可成為充分事實的「太平洋時代」，其主要的現實推動力或組成部分有下列幾股：

其一，日本的成為世界性經濟強國，長期以來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經濟成長率最高的一個，以面積狹小的島國而國民總產值竟能直迫美、蘇兩大「超級大國」，不久前已有美國學者如伏爾高（Ezra Vogel）等驚覺地提出了「日本第一」的說法。

其二，中國在政治上的復興與崛起並初步奠定工業化基礎，近年在鄧小平主政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已重建與國際資本主義的較緊密經濟連繫，總的來說，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雖不算很高，但也不算低，以中國國家規模的龐大，長遠看將會是未來「太平洋時代」的主要環節。

其三，由中國處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台灣、香港，以及新加坡和南韓所合稱的「亞洲四小龍」，由60年代末期開始，這幾個地區及小國便已是舉世經濟成長率最高的區域，成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地區」走向工業化、現代化的成功典範，說它們是「亞洲四小龍」已是謙遜，確切地應是「世界四小龍」，只不過它們都位於亞洲太平洋區而已。

其四，至今仍是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其經濟發展重心亦已由傳統的東部——大西洋區域轉而到新興的西部——太平洋區域，顯示着以大西洋區域作為腹地的西方世界內部，太平洋區域的經濟重要性亦正在提高。

根據上述分析，「亞洲四小龍」的高速工業化、現代化發展，對「太平洋時代」的來臨是有著重要作用的。雖然「四小龍」中的新加坡出現了挫折，但香港與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均達到10%以上，南韓更超過12%；明顯得很，香港、台灣、新加坡、南韓與北美、西歐、日本的經濟發展差距及現代化水平差距已縮短，以至香港已被認為比紐約、倫敦、巴黎等西方大都會更繁榮，但較諸東京則似乎仍有不如（這是我在日本旅行時的觀察）。

目 錄

序：

香港繁榮的「震撼」與「四小龍」…………… i

第一章：

第三世界的發展經驗與「四小龍」模式…………… 1

第二章：

「四小龍」的高速成長與矛盾調節…………… 19

第三章：

台灣經濟的「國家調節」與「技術官僚」…………… 37

第四章：

東亞現代化與東方——中國傳統文化…………… 59

第五章：

促進亞洲太平洋區「兩制」和平合作的趨勢…………… 85

第六章：

「四小龍」發展經驗與一些宏觀理論檢討…………… 97

註釋…………… 125

第一章

第三世界的發展經驗與 「四小龍」模式

「四小龍」與第三世界

所謂「亞洲四小龍」，當我們研究它們在經濟成長及現代發展的相對成功的時候，發現它們之間誠然有着明顯的各自特殊性，但也同時有著顯著的類似共同性；並且正是這些共同性顯示，在廣大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地區」裏，香港、台灣、新加坡、南韓之所以能夠率先進入現代化社會的先進行列，是並不偶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6、70年代以來的最近二十多年間，在第三世界屬於資本主義體制的地區中，於經濟處境上取得較突出改善成績的主要有三組國家和地區：

第一組正是以港、台、星、韓所謂「四小龍」為代表的亞洲太平洋區，多年來這裏已是全世界經濟成長率最高的區域，不管經濟發展、社會變遷、還是對政治民主化的要求，這區域的急速演變都引起舉世矚目；除了「四小龍」之外，這區域裏的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的經濟成長及現代化發展水平雖較低，但在整個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地區」來說，也屬較佳發展（尤其馬來西亞）。

第二組是以巴西、墨西哥、智利等為代表的與美國關係密切的自然資源富庶的拉丁美洲大中型國家，在以美資為主的國際資本及先進技術大規模灌注引進之下，巴西更是日本有計劃的殖民對象，這些國家的經濟成長率也曾相當高，經濟發展也促進着社會結構朝向現代化形態的演變。但與「亞洲四小龍」明顯不同的是，這些國家由於幅員遼闊，人口龐大，現代化發展的所謂「擴散」（Trickle Down，或譯「滴流」）效果並不能像「四小龍」那樣容易推進（「四小龍」中的香港與新加坡根本就類似於「城邦」，台灣與南韓的社會規模也屬小型），以至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典型「二元化展」（Dualistic Development）——包括城市與鄉村之間，沿海與內陸之間，大城市內部貧富之間的懸殊以至斷裂，而這些情況在「四小龍」卻要輕微得多，也就是說，作為「發展中地區」急劇現代化所引起的負面發展（或代價），「四小龍」要相對地少些（當然遠不是沒有）；而另一方面，「四小龍」雖也有本土資本與國際壟斷資本之間的矛盾問題，但卻不至於像美國資本緊密控制拉丁美洲那樣的嚴重程度，相反，港、台、星、韓的本土資本或民族資本卻迅速提高結構性比重，而成為新興經濟勢力。

第三組是以科威特、沙地阿拉伯、利比亞等為代表的盛產石油的中東伊斯蘭國家，自從產油國組織於1973年打出「石油武器」而油價暴升之後，這些國家的經濟境況迅速改善，兼之人口少，平均國民收入相當高；但在傳統約制下，這些國家的經濟富裕卻沒有引起劇烈的社會結構變遷。

第三世界三類先富地區

（在芸芸一百多個第三世界國家之中，有三種類型或三組國家及地區是得到較顯著的經濟發展成績的，這些「先富起來」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合起來有十多個，無論人口和面積都只佔整個第三世界的很少數，但這些國家及地區的人民卻是幾十億第三世界人民中生活得最好的，其中一些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水平，已經直追西方及日本的先進工

業國家（例如被稱為新興先進工業化地區的「亞洲四小龍」），一些國家的平均個人國民總產值（GNP PER CAPITA）更超過了西方及日本的先進工業國家（例如靠「油錢」而暴發的一些人口少而石油出口量大的中東伊斯蘭國家），而「亞洲四小龍」中最突出的香港，雖然其平均個人總產值與平均名義工資與先進工業國家仍有一段相當距離，但在明顯較低得多的物價及勞務服務價格相對照之下，其實際生活水準在好些重要方面並不遑多讓。）

在「先富起來」的三種類型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之中，那些靠巨額「油錢」而暴發的中東產油國，其發展模式對其他非產油國是沒有參照價值的，而且即使產油國中也不是每一個都特別富裕，必須同時加上人口特別稀少的條件，例如波斯灣畔的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科威特，其平均個人國民總產值在踏入80年代之初便已超過2萬美元^①，比西方及日本等先進工業國家的平均個人國民總產值高出一倍以至近倍半，他如沙地阿拉伯亦稍高於西方及日本的平均個人產值，利比亞則相差無幾。

這些當世最富裕的國家（甚至出現了諷刺性的所謂「太富」問題），當在二十多年前，它們之中的大多數還處於「窮國」狀態（大概只有科威特是較早富裕化的），轉捩性的關鍵是1973年產油國組織的打出「石油武器」，將國際石油市場由傳統受先進工業國家支配的「買家市場」扭轉為「賣家市場」，從此世界上便冒出了一批阿拉伯人超級富豪；西方市場上出現了阿拉伯資金的收購企業活動，國際政治上更先有卡札菲、後有科曼尼的尋求伊斯蘭文化復興，以有意識地「反西方」——無可置疑，「阿拉」的物質基礎在於石油！

然而，這些伊斯蘭產油國富裕則富裕了，但由於其致富原因的非常特殊性質，即使成了世界首富，其他非產油國的發展中地區也是無從模仿的。在第三世界的三種類型「先富起來」國家和地區中，較廣泛地被考慮為對其他發展中地區具有參照作用者，實際上只有「巴西模式」及「四小龍模式」兩大類型，而自從巴西、墨西哥等因超級龐大的外債而拖垮了國民經濟，從而使「巴西模式」的神話被戳破之後，現在仍然具有較活躍生命力的，可說是「四小龍模式」。

中東的一些伊斯蘭產油國雖已成為超越先進工業國家的世界最富裕地區，儘管先進石油生產技術、汽車、電腦、先進武器等「西用」已在伊斯蘭社會產生顯著作用，但從「親西方」的沙地阿拉伯到「反西方」的利比亞，伊斯蘭政府都有意識在沙漠綠洲上保存傳統游牧式的伊斯蘭生活方式，他們顯然是採取伊斯蘭傳統結構及價值為「體」，西方先進技術為「用」的發展策略，以至由石油出口帶動的急速經濟成長，卻對其本土社會結構並沒有帶來互相適應的現代化變革。

「伊斯蘭模式」是不可能被考慮為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地區」具有普遍意義的。

60年代中期以來，在西方研究第三世界經濟學中佔居主導地位的「發展經濟學」，相繼提出了兩個有意將之視為對「發展中地區」具有廣泛參照價值的「樣板」——「巴西模式」與「四小龍模式」；在時間上，「巴西模式」之於國際上傳揚起來，要比「四小龍模式」早一些，但二十多年發展下來，「四小龍模式」卻顯然要比「巴西模式」強韌而具持久生命力。

雖然「四小龍模式」所面對的種種困難，亦已日益暴露了出來——這裏需要作出說明的是，所謂「四小龍模式」只是一概括性的稱謂，事實上，香港、台灣、新加坡、南韓的發展模式在具有相類的共同性的同時，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性。

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國家，可說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以至戰後初期，便已是整個第三世界最進步或較具現代化發展成份的區域，它們在政治上最先取得主權國家的獨立形式（雖然美國的政治影響力具有明顯特殊作用），在經濟上最先建立起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一定基礎（雖然美國資本亦具有明顯的結構性比重以至支配作用）。

直至某些中東產油國在70年代暴發之前，除了香港、新加坡、以色列等少數細小區域之外，這些拉丁美洲國家的平均個人國民總產值，長期以來都是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地區」最高的。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基礎上，巴西在1964年發生親美右翼軍人政變，此後即以「為了發展」為理由而強力鎮壓政治反對派並厲行軍人專政式統治，另一

方面則大規模引進美資等外國資本，大規模向國際金融組織舉債，優先發展重點區域地推動巴西的較高速經濟成長及現代化發展，而「巴西模式」之名亦由此而來。

至於亞洲太平洋區的「四小龍模式」，其引起世界注目則要比「巴西模式」稍遲，約在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才開始較急速地推進，以至取得了高於巴西的經濟成長率，並且沒有產生巴西那麼嚴重的負面發展。

「四小龍」七十年代「起飛」

所謂「亞洲四小龍」之名，是在70年代才出現的，實際上，在這「四小龍」之間，明顯的差別也是存在的——在70年代以前，香港、新加坡這兩個「城邦」式的微型地區，早就是整個第三世界裏最具現代化發展型格的大城市及國際大港，不僅平均個人國民總產值較高，而且經濟成長率也很高，被視為東方的「雙城」。

至於台灣和南韓，在70年代以前，與香港和新加坡的發展水平是明顯的相差一大截的，當時台灣仍是一個相當封閉的社會，走向現代化的經濟「起飛」（Take-Off）及社會結構變革仍未取得突破，雖然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已經取得一定的基礎（事實上，台灣早在日治時代便是日本所有殖民地及勢力範圍中工業化基礎僅次中國東北的地方），但傳統的形態仍然甚為濃厚。

南韓方面，其在作為日本殖民地時的工業化基礎更不及台灣，在50年代初期更經過3年的戰爭破壞，人民生活水準不高，可說是「亞洲四小龍」中原來發展條件最低的一個；南韓的急劇發展，基本上是70年代至80年代的事，甚至到了踏入80年代初期的1981年，根據世界銀行發表的資料，仍然顯示南韓的平均個人國民總產值（1700美元）較諸馬來西亞（1840美元）之類的較高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為低，而在同年，台灣的平均個人國民總產值已經超過了20000美元，新加坡及香港更已分別達到5240美元及5100美元②。

然而，在80年代，即使有着持續的政治動亂，南韓卻連年取得比

較高的經濟成長率，例如在1986年，南韓的經濟成長率（12.5%）^③更高踞「亞洲四小龍」之冠——也是全世界之冠，兼之南韓是「亞洲四小龍」中的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個，本土自身的社會資源比較豐富，近年的發展勢態是強勁的。

與曾經被西方的「發展經濟學」捧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地區」現代化「樣板」的「巴西模式」作比較，後勁更强的「四小龍模式」實有着很多不同的特點，所產生的正反效果也有明顯的差異；從國家或地區的規模、與國際資本的關係、在世界性資本結構轉變裏所扮演的角色、經濟發展基本策略、經濟成長模式及主要帶動力量、本土資本的性質及作用地位、文化背景、政治結構、社會政策及結構性變遷、主導意識形態、民衆運動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兩大國際陣營對抗到和平共處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及由此引伸的外交關係……等等，「亞洲四小龍」的相對成功以及其結合在一起的缺陷，都是與上述各方面的因素緊密地交織的。

「發展中地區」尋新路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亞洲和非洲大部分過往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紛紛獨立、或要求擺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控制，民族獨立運動盛極一時，以至誕生了好一大批新興的主權國家。

在50年代，這些新生國家與拉丁美洲連在一起，開始形成了所謂「第三世界」（Third World）的概念範疇，意謂在先進資本主義世界（所謂「第一世界」）及以蘇聯為中心的國際共產黨世界（所謂「第二世界」）以外，形成另外一個區域更廣的國際性範疇，亦嘗試尋求新的發展模式。及至60年代初期，大約在1964年聯合國召開第一屆貿易發展會議前後，以「第三世界」的範疇作基礎，又形成了所謂「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或「發展中地區」（Developing Districts）的新概念範疇。

「發展中地區」的根本問題是「落後發展」（Underdevelopment），也就是如何克服、消除「落後發展」的原因

以求取「發展」——擺脫傳統小生產的農業社會以走向工業化大生產及整體結構的現代化（必須加以說明的是，西方由於二百多年來在現代化過程中走在前列，現在「發展中地區」要走向現代化，便無可避免要大規模吸收西方文化因子，但總的來說，「現代化」的概念畢竟不能等同為「西方化」）。

由40年代末期以來，部分「落後發展」國家（包括佔了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之所以走上共產黨全權主義的道路，其客觀的根本性質，也在於嘗試找出一種「非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模式，主要依憑「國家」力量去消除「落後發展」原因及推動走向現代化的「發展」。

在第三世界的每一個「發展中國家」或「發展中地區」面前，都存在着兩種可能性，為了較高成效地推動工業化——現代化（包括人的解放及物的效益兩大方面），究竟基本上採取資本主義模式還是「非資本主義」模式？自從兩大國際陣營的對抗由50年代中後期開始走向相對緩和的和平共處之後，兩種工業化——現代化模式要求和平競賽去決定勝負而不是訴諸戰爭的趨勢——看那一種模式能更好地實現人的解放及物的效益——後者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經濟成長率，這樣的和平競賽方向越來越顯著。

在西方，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以資本主義模式達成高經濟成長率及現代化發展的「發展經濟學」，遂在這樣的國際背景裏應運而生，而60年代以後發展出「巴西模式」、70年代以後發展出「四小龍模式」，客觀上都是有着與「非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和平競賽的歷史宏觀意義的。

「兩制」和平競賽與「四小龍」

國際上不同的工業化——現代化模式之間的和平競賽如果能夠長時間進行下去的話，同一個命題放到中國範圍內，便是「一國兩制」——「非資本主義」主導的、共產黨全權主義模式的中國大陸，與資本主義模式的台灣、香港（「亞洲四小龍」之二）之間的和平競賽如果能夠長時間進行下去的話，其結果實在不外乎三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現代化模式各方面都表現出優越性，使實行「非資本主義」模式的地區感受落後的壓力而全面轉向資本主義模式——這是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

第二種可能性是，「非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現代化模式各方面都表現出優越性，使實行資本主義模式的地區感受落後的壓力而全面轉向「非資本主義」模式——這是「非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

第三種可能性，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現代化模式均在不同方面有着各自不同的優越性及落後性，一方面各具勝長，另方面各有缺陷，不是任何一種模式全面取代另一種模式，而是兩種模式的優點走向綜合，同時則揚棄兩種模式的缺點，從而在長期和平漸進的結構改革過程中，逐步形成一種新的「混合模式」。

照我的意見來說，今後中國在推動「一國兩制」實踐的過程中，要以上述第三種可能性成為事實的潛在趨勢最大。

現在資本主義的香港和台灣雖然表現出世界名列前茅的高經濟成長率及現代化發展速度，實行「非資本主義」模式的中國大陸亦要接受「資本主義補課」④，但香港和台灣的資本主義模式內部卻也確實存在着日益深刻化的結構性缺陷，需要作超越性的克服。

而中國大陸的「非資本主義」模式，在結合資本主義功能因子作為「補充」的結構改革而形成「混合模式」之後，經過理性化改造的公有制主導及計劃運作，對高速經濟成長及現代化發展也是有積極作用的——誠然，這至低限度需要半個世紀以上的發展時間。

在中國範圍內是「一國兩制」的長期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改革，在全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現代化模式也需要進行長期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改革，除了中國（包括台灣、香港）之外，朝鮮（韓國）的發展前景裏也有着出現「一國兩制」的可能性。從這樣的角度來看，「亞洲四小龍」裏的「三小龍」，不管就其所從屬的本國言，還是就世界全局言，都對上述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改革有着非常特殊而重要的位置。

「四小龍模式」的特殊性

「亞洲四小龍」由於國家或地區的規模過分細小，因此，雖然這兩個小國（南韓、新加坡）和兩個小地區（台灣、香港）取得舉世最高的經濟成長率和現代化發展速度，但若據此便認為「四小龍模式」對整個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地區」或「發展中國家」都具有普遍意義，那顯然是武斷的，至低限度，下列的幾點事實都使「四小龍」擁有其他「發展中地區」所難以同時擁有的特殊條件。）

首先，香港和新加坡根本就是「城邦」式社會，農村人口微乎其微，沒有自身管轄範圍內的腹地，可說沒有將現代化成果由少數重點「擴散」到廣大區域的問題，城市人口因工業化發展而急速提高的平均個人總產值及收入，並不會因為有龐大的農村人口而被拉低；至於南韓和台灣，社會規模雖比香港和新加坡大很多，但基本上仍屬小型國家及地區，台灣早在作為日本殖民地時代，城市化的水平便已為先進工業國家以外所僅見（城市人口在40年代便已高佔全島人口的四成多），因而當進一步工業化發展起來後，「擴散」的困難亦比較少。

相對之下，南韓由於面積較大（98000多平方公里，比台灣大2.7倍），人口較多（現約4千萬人，比台灣多2.2倍），「擴散」的困難也就明顯較大，但若與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大、中型資本主義國家作比較，南韓的「擴散」問題卻又遠為容易解決得多。）

例如說，巴西雖也曾取得接近「四小龍」水平的經濟成長率（在70年代的平均年成長率為8.4%），但卻在沿海少數大城市與內陸腹地之間，以至城市內部不同社會層份之間做成了堪稱斷裂性的發展，貧富懸殊極之嚴重，據兩位法國學者杜蒙（RENE DUMONT）與莫坦（MARIE FRANCE MOTTIN）所著作的統計資料，80年代初，巴西3萬多富豪的收入幾乎等於1千萬巴西最貧窮的人的收入，巴西的貧富差距是法國的21倍，在巴西全國1億2千多萬人口中，沒有固定收入的「社會邊緣人」竟高佔百分之50（即約6000多萬人，比南韓和台灣的總人口還要多一些）^⑤；美國著名的「發展社會學」家柏格爾（PETER BERGER）亦認為「巴西乃是瑞典加諸印尼之上」，「整個

巴西大致可劃分為兩個國度，巴西8500萬窮人在巴西「現代化」過程中所陷進「慘境的人類代價真可謂為『無辜者的大屠殺』」，以百萬計的巴西人民因貧窮而「過早」死亡⑥。

然而，「亞洲四小龍」在取得高經濟成長率的同時，卻沒有產生這樣惡劣的負面發展情況（貧富分化誠然有，但卻遠不能和巴西的惡性斷裂相比），原因可能相當複雜，但「四小龍」的社會規模細小，現代化成果的「擴散」問題較易解決，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巴西則已可視為「發展經濟學」的「擴散」理論失敗的重要例子）。

（雖然有很多細小的「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地區」的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情況並不好，但「亞洲四小龍」之比較順利地取得高速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成就，卻確實與它們的國家或地區規模細小有直接關係；這是當我們評估「四小龍模式」對整個第三世界的意義時，必須予以注意的，顯然「四小龍模式」對大型以至中型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地區」都是難以作為「樣版」的。

（其次，香港和新加坡早就是亞洲最具基礎的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資金匯聚的充裕，不要說第三世界，就是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第一世界）中也不多見。

至於台灣和南韓，從50年代初韓戰爆發到70年初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之間的超過20年時間裏，由於對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區的政治和軍事戰略具有重要地位（南韓之於美國的這種重要地位則至今仍未改變），美國曾在這兩個地區大量投入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南北韓分治到70年代末，美國對南韓的援助積累估計共達130億美元之鉅，而在1965年美國停止對台灣的經濟援助之前，美援台灣亦以數十億美元計⑦。

由此可知，在70年代取得經濟「起飛」突破之後，美援對南韓雖已並不那麼重要，台灣更已不再有美援，但在5、60年代為經濟「起飛」準備基礎的階段，美國援助對南韓和台灣的經濟成長無疑是有着重大助力的；誠然，世界上曾經接受美援或其他外援的「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地區」很多，但若以外援數額和人口比例（社會規模比例）計算，南韓、台灣在5、60年代所得到的美國援助是特殊地大的。